

亦子亦友
亦师亦友
父子年谱

北京出版社
王利器

KERT/122

王利器

亦工亦拙亦與父子季譜

紅樓夢與清初史料鉤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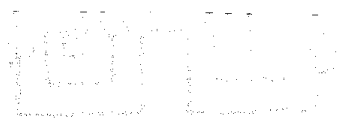
沈从文
文出时年

北京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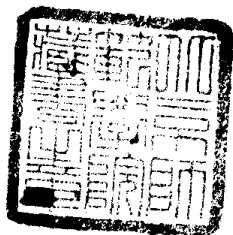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13359



913359



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

——《紅樓夢》與清初史料鉤玄

王利器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門外東興隆街 51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印刷一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18.5 印張 400,000 字

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9,100

書號: 11071·159 定價: 2.70 元

序 言

李士楨、李煦父子服官從政之年，主要都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中。這六十一年，是清代全盛時期。他們父子倆，李士楨以股肱元良，李煦以耳目親近，與康熙不僅是一般的封建君臣關係，而且還具有特殊的主子與奴才的關係。因之，我在撰寫這本年譜時，除儘量地詳述李氏父子行事外，還適當地編纂了康熙一朝的大事。治史者對於史料，不能有任何主觀片面性，更不能強古人以就我，或加以美化，或加以醜化，而應當如列寧所指出的：「從事實的全部總和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。」〔一〕這本年譜，就是試圖達到這一要求，而從客觀實際出發，詳盡地占有第一手材料，把當時的歷史全貌，如實地再現出來。

現在，先把李氏父子行事提挈一般，然後就密摺問題，提出我的初步看法。

廣東巡撫李士楨

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來看，李氏父子，不僅在當時宦績斐然，而且還是清代的功臣。張志棟、李大中、丞憲、政錄、序寫道：「中丞李公，為都昌望族，世有隱德。我朝定鼎燕都，公為從龍碩彥，歷陟顯仕，宦蹟不可枚舉，游晉使相，開府豫章，旋撫南越，治行卓卓，擬之李西平之六遷大鎮，柳仲

鄧之屢易外藩，何多讓焉。」〔二〕對李士楨的政績，作了全面的評價。我們再結合着當時一些知名之士對李士楨的稱道來看：魏象樞在保舉疏中寫道：「其人操守清介，才品優良，有守有為，在任之時，與陞任之後，父老子弟頌清廉愛民者，如出一口。」〔三〕又寄李毅可藩司書寫道：「乃兩浙為財賦重地，忽遭叛逆，地方之荼毒，百姓之困頓，強半不堪言矣。幸而聖主簡任高賢，借司藩政，清以率下，惠以安民，俾赤子樂其寬仁，竭厯賦稅，佐軍餉浩繁之需，不致司農仰屋而興歎者，皆老祖公愛民之效也。」〔四〕毛奇齡寄李方伯寫道：「鶴繡犀鞶照錦茵，屏藩高啟浙河濱。關中運轉推蕭相，洛下軍需藉寇恂。……」〔五〕李漁贈方伯李毅可公祖聯寫道：「廉明寬厚孰如公？據吏民愛戴之心，願常似此時藩兩浙；品望勳勞堪作主，揣君相推崇之意，知一交來歲撫三軍。」〔六〕陸元輔壽兩浙方伯毅翁李公六十序寫道：「國家建官樹屏，外設大方伯以理財賦，其重與內之大司農等。故總天下之食貨，為之權其出入，時其贏縮，以裕經費，而不使有仰屋之嗟者，大司農也；總一方之食貨，為之慎其筭鑰，清其徵解，以廣積儲，而不使有中飽之蠹者，大方伯也。然為方伯於他省易，為方伯於兩浙多事之日尤難也。」昌邑毅翁李公，以三韓斗山之望，膺兩浙蕃宣之寄，官居都會，時值兵荒，內外交訌，滿、漢援勦之師，雲屯星聚，凡糗糧芻芻之需，弓矢甲冑之器，帷幙屏履之物，鉞鐸砲礮之資，一切取給於藩司，軍檄如雨，刻期責辦，卽素號才能者，莫不斂手太息。公幹略夙優，如干將莫邪，應機立斷，以惠感民，而輸將者不敢後；以正率寮，而催科者不敢私；以嚴駁吏，而守藏者不敢盜；故軍需常足，而士飽於伍，馬騰於槽，旌旗蔽空，甲兵耀日，藩王諸將遂得

有所倚賴，而敵愾受降，奏膚功於闕外矣。使非公之足食以足兵，雖良將勁卒，方且脫巾之不暇，亦安能奮揚武威哉？昔蕭何鎮關中，饋餉不絕，以給軍糧，淮陰、絳灌輩因得展其才勇，而項籍以衰；王堯臣爲轉運，充蓄積以佐軍興，韓范、种師道輩因得抒其謀略，而元昊自服。今公佐於倥偬之際，能易人之所難者如此，視蕭、王二臣，殆有過之，無不及焉。〔七〕法若真元日雪中留別虎林諸君子有云：「借君南北勞輪輓，自住炎、紹宰相家。」原注：「毅可藩伯，其衝原宋相府。〔八〕曹溶與李毅可書寫道：「四千里外，惟聞憲度清肅，仁浹義昭，海隅蒼生，咸有化日之樂，鯨鯢息警，海不揚波，想像治風，不啻身親霑被。……然而成效雖臻，勞心百倍，偃武事而崇文教，區畫良難，每頌封章，知大臣任事之不易也。〔九〕又寫道：「惟悉祖臺節制海邦，武事長偃，由是宏開泰運，翠輦巡遊，宥過捐租，流恩及遠，吳越之民，未嘗忘所自也。〔一〇〕尤侗東萊政紀序寫道：「經營南北，首尾幾四十年，美政良法，更僕難數，而總其大端，惟浙藩、廣撫二任，厥功稱首。蓋公之藩於浙也，值耿逆之亂，軍興旁午，王師數十萬壓仙霞關，轉餉絡繹，晝夜不給。時武定相公仗鉞行間，而公佐其帷幄，運籌決勝，卒使士飽馬騰，居人安堵，此公之功也。及其撫廣，尚逆餘孽，竄伏山林，土寇乘之，跳梁滋蔓，百姓遷海之役，雞犬不寧，室多遺糧，市有冤獄，公武震而文教之，綏靖兵民，滿漢協服，兼之設花縣，建瓊樓，開節使之衙，修貢舉之院，皆大有造於一方者，此又公之功也。〔一一〕高琦李大中丞政略跋寫道：「當其開府江右，而條畫機宜，其奏疏文移者若彼；洎擁節東粵，而彈壓控制，其爲披陳敷宣者若此。此非古大臣勉勉入告，而惓惓爲民請命，

其孰能之。〔二二〕所有這些，都異口同聲地稱道不衰，難道他們對李士楨都是阿其所好，而故爲此過譽之詞，溢美之言嗎？我們再拿李士楨自己的言行來看吧。李士楨兩任巡撫，乃心乃力從事國計民生，爲清初成績卓異的封疆大臣。他認爲巡撫的職責：「察吏安民，興利除弊，皆職分之所當爲」；〔二三〕巡撫之職，卽唐、虞十二牧之遺制，歷代更改，銜稱雖異，要之，舉直省之兵戎、禮樂、錢糧、刑名，彰淑黜慝，使物則民彝，教養樂利，率其屬各修職業，遵守法令，以助流天子化理則一也。〔二四〕他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的。李士楨「長於文學，嫻於吏治」，〔二五〕居官以明代周忱〔二六〕、海瑞〔二七〕爲立身蘄向，在兩次巡撫任內，打擊藩商、嚴飭方面，剔釐積弊，整頓鹽政，「一切錮弊，痛切詳言」，〔二八〕從而制訂有針對性的切實可行之法。「凡有規正屬員，興釐利弊諸務，答講批詳，發於檄示，總爲澄清吏治，綏撫民生起見。〔二九〕在大兵之後，首先以恢復生產，安定社會爲要務。他一方面引民間諺語指出：「署官如打劫」，〔三〇〕一方面又引俗語指出：「寧可青山望牢獄，不可牢獄望青山」，〔三一〕密切注意官方與民間的一切不利因素，從而因勢利導之。在理財方面，則以「恤商裕課」爲指導思想，他認爲所有稅收，「皆合生財之大道，非是額外之科斂」，〔三二〕「在公家不爲多取，在灶丁自應願輸」，〔三三〕「上無虧於額課，下無病於商民」，〔三四〕因之，「事久相安，在公不爲苛，在商亦以爲例也。〔三五〕尤其在處理蛋戶的問題上，李士楨以一封建大官，對於當時之所謂「賤民」，備極關心，〔三六〕採取適當措施，保障他們的漁業生產，實屬難能而可貴。高琦李大中丞政略跋寫道：「當逆藩乍平，瘡痍初起，一切防閑調劑之法，觸手拏若亂絲。公始至也，鎮之以靜，而

風勵官方，舉劾不遺餘力；其勤民也，撫之以慈，而驅屏豪猾，飭令無少假借。蓋自養士詰戎，惠農通商，以至瀕海天末，桑麻雞犬魚鹽蜃蛤之微，莫不詳毖有加，剔釐盡致，則是公之有大造於南土。〔二七〕當彼時彼地遭到嚴重破壞的經濟，既得到恢復，於是一系列建設，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，如修繕書院也，纂修通志也，倡建花縣也，興辦十三行也，如此種種，大而對於國家，小而對於地方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高琦李大中丞政略跋寫道：「宦績徧東南，所至赫赫有聲，即今豫章、建武，固已奉祀名宦，俎豆千秋。〔二八〕當李士楨在廣東致政歸，士民輟耕罷市，無不奔走哀號而不能捨，〔二九〕就是在退居通縣之後，康熙北巡，自口外回，還親臨其第，「慰勞再三，……出尚方之饈以賜。〔三〇〕尤侗東萊政紀序寫道：「要如公之敷歷中外，膺高爵，享令聞，而又能潔身告老，優游戚里之中，天子所報勞臣者良厚，豈不善始善終哉！〔三一〕」

蘇州織造李煦

李煦以「簪纓巨族，閥閱大家」，〔三二〕初仕韶州府知府，繼以迴避其父廣東巡撫李士楨，調浙江寧波府知府，既而入充暢春苑總管，又出任蘇州織造，管理潯墅關稅務，兼司揚州鹽政，時人如尤侗〔三三〕、鄭際泰〔三四〕，俱有「是父是子」之稱。張志棟寔政錄序以為煦之「器識文藝」，與其父士楨「後先，他亦世濟其美」。〔三五〕他之調任紹興府知府，韶州人為立去思碑，〔三六〕建遺愛祠，〔三七〕鄭際泰去思碑文還說：「全無白璧之瑕，久有青天之譽」。及守寧波，「甫為政一年，頌聲大作，於是士

大夫錄其詩若干首，登之劄劄，名之曰李侯德政詩。〔三六〕及「奉命作服，爲一人耳目之官」，〔三七〕又逢康熙南巡四次，克己辦公，工匠經紀，均沾其惠，稱爲李佛子。〔三八〕這些，在年譜中，都有所反映，用不着再加觀縷。李煦之出任蘇州織造，和曹寅、孫文成之出任江寧、杭州織造，是經過康熙精心安排，而又有所分工的。雖然，「三處織造，視同一體」，〔三九〕這就是紅樓夢所說的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」的歷史背景。實則「孫文成年紀已老，對曹寅、李煦也很無益」，〔四〇〕因之，康熙給李煦的殊批又特別指出：「曹寅於爾同事一體。」〔四一〕因之，李煦與曹寅在三織造中的作用遠非孫文成所可比擬的。李果在儀徵江亭記裡寫道：「曹以明察，李以寬和，無煩擾以樹威，風清吏肅」，〔四二〕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。當日者，康熙之於三處織造的分工，蓋從蘇州之於政治，江寧之於文化，杭州之於海防加以考慮的。康熙四十年（一七〇一）三月，李煦有與曹寅等議得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可去東洋摺寫道：「切臣煦去年十一月內奉旨：『三處織造會議一人往東洋去。』欽此欽遵。臣煦抵蘇之日，已值歲暮，今年正月，傳集江寧織造臣曹寅，杭州織造臣敖福合，公會議得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可以去得，令他前往。但出洋例候風信，於五月內方可開船，現在料理船隻，以便至期起行。」〔四三〕旋於六月有莫爾森已從上海出洋摺，寫道：「臣煦等恐從寧波出海，商船頗多，似有招搖；議從上海出去，隱僻爲便。莫爾森於五月二十八日自杭至蘇，六月初四日在上海開船前往矣。」〔四四〕又於十月有莫爾森出洋已回現已由蘇州進京摺，寫道：「一切照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，於十月初六日回至寧波，十一日至杭州，十五日至蘇州，十六日即從蘇州起程進京。」〔四五〕這次派莫爾

森去東洋干啥呢？硃批諭旨第四十一册李衛卷硃批寫道：「當年聖祖曾因風聞動靜，特遣織造烏林達麥爾森改扮商人，往彼探視；回日復命，大抵假捏虛詞，言其懦弱恭順，嗣後遂不以介意，而開洋之舉，繼此而起。康熙鑑於明季沿海倭寇之患，乃密遣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潛往東洋，調查其動靜，獲悉日本無侵擾意圖，於是制定了開海禁的政策。這件事很好地說明了杭州織造與海防的關係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一七〇五）李煦有接任兩淮鹽差日并進冬筴摺，硃批道：「凡蘇州來的各行人等，倘有多事者，爾察明即當奏知，不可少懈，不時訪訪纔好。」四〇蘇州在政治地位上的特殊之處，雍正曾經說得極爲明白，硃批諭旨第四十七册李秉忠卷，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三月初三日硃批道：「蘇州地當孔道，爲四方輻湊之所，其來往官員暨經過商賈，或遇有關係之事，亦留心體訪明白密奏以聞。織造、鈔關，雖兩處衙門，皆無繁勞辦理之處，與其空間無事，何如於此處留意，莫愛惜心力，趨避利害，一秉良心，爲朕效力，朕自然知悉。若惟徇一己之私，容默自使，及虛張聲勢，分外多事，亦不能逃朕之兆察也。勉之慎之。」結合着雍正這個硃批來看，更足以證成蘇州織造所承擔的特殊任務，此雖以後證前，然而正好說明雍正之「無改於父之道」，是一脉相承的。今天我們試就保存下來的李煦與曹寅的奏摺來看，李煦的密摺，其內容之廣泛，遠非曹摺所能比擬，即其數量之多，也超出曹摺三分之一而強，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，連康熙的「上諭」，也是交與李煦密送給巡撫，如康熙四十五年（一七〇六）三月硃批：「另有上諭一封，爾使人密送到巡撫處去，不可遲誤。」四九

而巡撫的奏摺，也是交由李煦奏達的，如康熙四十二年（一七〇三）四月硃批：巡撫宋學，以後有奏之事，密摺交與爾奏。〔五〇〕又如康熙五十三年（一七一四）四月二十一日硃批：江寧巡撫張伯行「已後倘有緊要事，爾家人恐有遲悞，交與李煦速來。〔五二〕下焉者，有如：管理潞野關奏摺也由李煦轉呈，〔五三〕兩淮運使謝恩摺也由李煦代陳，〔五三〕蘇州、常州、松江平糶官奏摺也由李煦代進，〔五四〕翰林院臣彭定求、徐陶璋等率領士庶謝恩也由李煦代奏，〔五五〕熊賜履之子志伊謝恩也由李煦代奏，〔五六〕天寧寺住持廣明謝恩也由李煦代奏，〔五七〕廣明謝恩摺也由李煦代呈，〔五八〕商人乞准開採也由李煦代奏，〔五九〕兩淮衆商求再借皇帑摺也由李煦代題。〔六〇〕至於李煦自己除經常有密摺之外，還以奴才身分會同總督、巡撫具題，〔六一〕會同總督、將軍、巡撫、提督會疏具題，〔六二〕會同總督、巡撫、河總、漕總繕疏題明，〔六三〕還有和江寧織造、杭州織造公會議而由李煦具奏，〔六四〕與江寧織造、杭州織造各發庫銀重修天寧寺佛像而由李煦具奏，〔六五〕不僅此也，就連像納監這樣的賣官鬻爵之事，也交由李煦包辦代替。〔六六〕從這些例證，我們完全可以歸納出蘇州織造的政治地位之爲何等了。

蘇州織造的政治地位既如此居要，而李煦的官聲又足以副之，把一個曾經博得青天、德政好評的官員，安置在這樣一個職位上，這比較恰當的。而李煦也頗能勝任愉快，想方設法地完成了康熙交給他的任務，從他的「幕中多名士」，〔六七〕人間稱佛子，這些事實來看，充分說明了這一點。因之，康熙之於李煦，不僅倚之爲耳目，而且還視之爲腹心，有兩件事頗足以說明這個問題。從來皇帝的起居，是不許人打聽的，然而康熙在五十六年（一七一七）六月十二日，却於硃批

中，事先告訴李煦：「七月盡間，卽哨鹿起身。」〔六六〕康熙四十七年（一七〇八）正月十九日，李煦有因家人途中遺失進摺自請處分并補繕摺，硃批道：「凡爾所奏，不過密折奏聞之事，比不得地方官。今將爾家人一並寬免了罷。外人聽見，亦不甚好。」〔六六〕這兩件事情充分說明了康熙之於李煦，他們主子與奴才之間的關係，已經達到不是「外人」的地步了。康熙幾次南巡，江南三織造，爲了逢迎，「拿着皇帝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」，虧空很大，尤其以蘇州、江寧二織造而兼管兩淮鹽務的李煦、曹寅爲甚。自從江南虧空案暴露後，康熙公開指示：「曹寅、李煦用銀之處甚多，朕知其中情由，故將伊等所欠銀廿四萬兩，令李陳常以兩淮鹽課羨餘之銀代賠。」〔七〇〕不僅此也，繼而復命李煦巡鹽，以餘銀補帑，「屢屢破格」，「種種破格」，〔七一〕以「罪外有罪」之人，而蒙「恩上加恩」之典，〔七二〕是誠如李煦自己所說的「皆奴才夢想所不到」〔七三〕者也。

至於江寧織造曹寅，以其所負使命爲網羅江南名士，使之校書，爲之刻書，把這一批人團結在「斯文一脈」的旗幟之下，從而消除民族間的隔閡，使社會穩步走向繁榮富強，爲大一統、多民族的祖國，作出貢獻。因之，曹寅之於名士，都把他們尊之爲座上客，而李煦則聘之爲幕下僚也。名士而爲座上客，固屬尋常，名士而爲幕下僚，這不是他的主人於吏治、官聲，如鄭際泰所說的「全無白璧之瑕」，而要把諸如李果、沈樞元之流的名士延攬於門下，那就恐怕很難實現了。

密摺與晴雨錄

由於蘇州、江寧兩織造，於本職外，還負有特殊任務，自來治紅學者，於此，對李煦、曹寅頗有微詞。今則二家密摺已公之於世，青紅皂白，有目共覩，庶幾可以執悠悠之口了。我在這裡，不想多說，只就密摺這種制度，提出我的初步看法。

老子第四十七章寫道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知天道。」漢書食貨志又把老子此文簡併成「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」一句。張浚在中興備覽二寫道：「堂上遠於百里，堂下遠於千里，門廷遠於萬里。人君端拱九重之內，而欲徧知天下之事，盡察天下之情，不亦甚難乎？」自來封建統治階級，都想把國家納入國泰民安的軌道，來鞏固其統治地位；要達到這一目的，首先必須周知天下之事，就成爲施政的起碼要求了。尚書舜典寫道：「詢於四岳，闢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。」僞孔傳寫道：「廣視聽於四方，使天下無壅塞。」孔穎達疏寫道：「明四方之目，使爲己遠視四方也；達四方之聰，使爲己遠聽聞四方也；恐遠方有所壅塞，令爲己悉聞見之。」這種廣視聽的辦法，自來統治階級都是十分強調的。遠之如管子九守主明寫道：「目貴明，耳貴聰，心貴智。以天下之目視，則無不見也；以天下之耳聽，則無不聞也；以天下之心慮，則無不知也。輻湊並進，則明不塞矣。」近之如戴兆祚編輯于公德政錄〔七四〕廣耳目寫道：「華陽所謂亂臣，四聰不達；孫叔敖稱爲良相，百姓無冤；耳目之司，發奸摘伏，何可廢也。然委任非人，洩漏招搖，簧鼓尤甚，此在知人善任耳。公四至之境，如

經身履，夾帶中淑慝井井，凡遇奸宄，錯雜百出，嘗我徐以片言折之，靡不照胆驚心，不必秦鏡高懸，始能燭奸，燃犀普照，方無遁形也。」由是可見，上自帝王，下至縣令，莫不以廣耳目爲施政的當務之急。我們再看康熙又是怎樣對待這一問題呢？康熙十八年（一六七九）八月戊子諭九卿詹事科道：「自古設立臺省，原係朝廷耳目之官，上之則匡過陳善，下之則激濁揚清，務求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乃稱厥職。」〔七五〕同月辛卯，上召吏部侍郎哲爾肯、屯泰至內殿諭曰：「朕親決幾務，十餘年矣。科道爲朝廷耳目之官，每覽奏疏，實能爲國、有裨政事者甚少，草率塞責者甚多。」〔七六〕康熙三十六年（一六九七）正月甲戌，諭大學士等曰：「科道乃耳目之官，如總兵卓策、柯彩、許盛，居官最爲貪鄙，朕聞其軍民皆怨，乃爲懲治，前此科道官曾有參奏者否？爾等以朕旨宣諭，儻後仍蹈前轍，必不寬貸。」〔七七〕康熙五十五年（一七一六）九月十七日，諭大學士馬齊等：「科道係朝廷耳目之官，俱有糾參之任。」〔七八〕同年十月初八日，諭大學士馬齊等：「朕令大臣皆奏密摺，最有關係，此卽明目達聰之意也，前古帝王行之者少。朕臨御五十餘年，凡臣下奏摺，細加體察，殊有裨益，設若浙江巡撫奏秋成八分，其福建從浙江過者詢之，或云十分，或云六七分，一有參差，便可知其虛實矣。摺奏之或公或私，朕無不洞悉，如果屬有益，卽當酌量施行；倘有徇私報復害人者，卽時發出，令衆知之，彼之真情有不畢露者乎？凡一切奏摺，皆朕親批，人不能知，內中亦不存稿，如張鵬翮爲總河時，其所奏摺，有一非朕親批者乎？既許摺奏，諸王、都統、大臣等，不能推測摺中所言何事，自然凡事皆戒謹恐懼。在今日開言路之法，莫善於此。凡爲小臣時，大都願開言路，及爲

大臣，則又不願；而不知摺之公私，朕一見便悉，不能掩也。爾等可傳諭九卿，特諭。」〔六七九〕而且康熙還要求：「凡可奏聞之事，即當先一步才好，事完之後，聞之何益。」〔六八〇〕康熙積數十年之經驗，深知廣開言路之道，莫善於密摺，而「密摺之或公或私，無不洞悉」，能够得出這樣比較公正的結果，這就是從各方面所奏一事之參差，加以比較，平情酌理，辨別真偽，而得其虛實，這樣便可減免偏聽偏信之弊，而臣下也不敢妄奏了。韓非子有度篇寫道：「上用目則下飾觀，上用耳則下飾聲。」舊注：「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，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。」康熙之能不爲臣下飾觀飾聲所蒙蔽者，就在於不輕易偏聽偏信耳。

李煦以及曹寅，作爲康熙之耳目，主要就是通過密摺來進行的。由於李煦、曹寅都是包衣下賤，位爲織造，而密摺係「不當宣露之事，從不令四目六耳見聞」，〔六八一〕他和科道之具本題請，大不相同，蓋科道爲朝廷之耳目，而織造則爲皇帝一人之耳目也。康熙三十八年（一六九九）五月二十六日，曹寅奏明會議監修明陵及江南雨水糧價摺寫道：「除署總督臣陶岱、巡撫臣宋學曾同臣寅具紅本奏陳外，臣寅係家奴，理合先將會議情由，具摺奏聞。」〔六八二〕五十六年（一七一七）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李煦瓜洲花園港一帶須做埽工商人願再捐銀摺寫道：「奴才現在會同督臣、撫臣、河臣、漕臣繕疏題明外，謹先具摺奏聞。」〔六八三〕這兩樁事情，最足以說明問題，即身負特殊任務之織造，得與總督、巡撫、河總、漕總，會同具疏，但必須於具疏題本、紅本之外，先具密摺奏聞。由於李煦、曹寅之於康熙別具有主子與奴才的特殊關係，因之，康熙對於這些奴才，在密摺這個具體問題上，是從來

不假以詞色的。首先文字不通的，就加以斥責：「此摺字言不通，不合奏體。」〔八四〕該奏不奏的，就問：「還有崇明總兵一事，爾自然聞得，如何不奏知？」〔八五〕奏遲了，就責怪：「朕早知道，此摺奏遲了。」〔八六〕晴雨錄如何遲到今年纔奏？不合。明白回奏。」〔八七〕奏得不詳明的要再奏：「此摺斷不可叫人知道。再打聽明白奏聞。」〔八八〕此摺不甚明白，再寫奏來。」〔八九〕不當奏的就嚴厲指出：「此事非爾可言。」〔九〇〕奏得不合禮的就痛加辱罵：「請安摺子，不該與此事。」〔九一〕一處混寫，甚屬不敬。爾之識幾個臭字，不知那去了！」〔九二〕至於李煦所求之事，有行不通的，就指出：「借帑一事，萬萬行不得，再不要說了。」〔九三〕從事打點時就告誡：「爾向來打點處太多，多而無益，亦不自知。」〔九四〕已後凡各處打點費用，一概盡除。奉承上司部費都免了，亦未必補得起鹽差之虧空。若不聽朕金石良言，後日悔之何及。爾當留心身家性命子孫之計可也。」〔九五〕由此可見，康熙對於奴才們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。因之，密摺這一制度，不僅達官貴人們頗有戒心，一聽有密摺，都戰戰兢兢，不知是點了誰的名；而上密摺的人，也知「干係爾身禍福不輕，須慎之又慎」〔九六〕的了。

雍正即位之初，對於密摺制度，頗為欣賞。硃批諭旨第三十六冊宋筠卷批道：「好！勉之密之。密之一字，更爲切要。」又第四十八冊廖坤卷批道：「嘉悅覽焉。密之密之。」又第五十冊高斌卷批道：「再有密奏事件，自行書寫甚好。」因而雍正對於密摺還提出一些具體要求，硃批諭旨第四十八冊鄂昌卷批道：「今許汝等下僚亦得摺奏者，不過欲廣耳目之意。於汝責任外，一切地方之利弊，通省吏治之勤惰，上司孰公孰私，屬員某優某劣，營伍是否整飭，雨暘果否時若，百姓之生計若何，風

俗之淳澆奚似，卽隣境遠省，以及都門內外，凡有駭人聽聞之事，不必待真知灼見，悉可以風聞人告也。……但密之一字最爲要緊，不可令一人知之，卽汝叔鄂爾泰亦不必令知。假若假此擅作威福，挾制上司，凌人舞弊，少存私意於其間，豈但非榮事，反爲取禍之捷徑也。當仰遵朕訓，慎之又慎。」雍正這個硃批，對於研究密摺，有極大的史料價值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密奏的人，還要求他們大義滅親，堅決做到「移孝作忠」的爲臣之道。易繫辭上說得好：「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」這就是康熙、雍正都強調調密之一字最爲要緊的原因之所在了。然而曾幾何時，却在雍正十三年（一七三五）又把這種制度廢止了。佚名八旗事例會鈔分別題奏咨條寫道：「十三年十一月，奉上諭：『向來各處本章，有題本、奏本之別，地方公事用題本，一己之私用奏本，題本用印，奏本不用印。其式沿自前明，蓋因綱紀廢弛，內閣、通政使借公私之名，以便上下其手。究之，同一人告，何必分名色？着將向來奏本之處，概用題本，以示行簡之意。將此載入會典，該部通行傳諭知之。』」（九七）本來密摺這種制度，利弊都有，君臣上下，如一秉之公，則利大於弊，反之，如出之以私，那就弊大於利了。康熙十八年（一六七九）八月戊子，諭九卿詹事科道，論及耳目之官的流弊時，指出：「治國家者，在有治人，不患無治法爾。」（九六）由於有治法，無治人，讓假公濟私之徒鑽了空子，就廢除這種制度，從而對高官大吏失去一種有效的約束力，使之越發肆無忌憚，那就無異於因噎廢食了。

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裡，封建時代，也有一些帶有民主性或科學性的東西，可供後代的借鑑和